

东中西部关系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魏后凯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极大,协调发展在我国是一个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本文通过对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地域分工与区际贸易格局、产业关联及产业要素流动等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共生”关系等区域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对建立以协调发展为特征的新型东中西部关系提出了新见解。

作者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一、区际贸易格局与区域经济运行机制

根据技术经济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可把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①。这三大地带,无论是自然环境、资源条件,还是技术经济水平等都相差甚大。从总体上看,土地和自然矿产资源偏集于中西部,呈西多东少的态势;而产业、人口与城镇、技术偏集于东部,技术经济水平呈现出东高、中中、西低的梯度分布态势,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中部中等发达地区、西部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等级的区域经济格局。这种资源和技术经济在空间上的双重逆向梯度分布,构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其战略抉择的基础。

建国以来,我国采取了试图改变这种双重逆向梯度分布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并按照“资源互补”或“产品互补”的原则来组织区域经济体系。“资源互补”或“产品互补”是指在旧体制下,以部门管理来代替区域管理,各个职能部门分割区域经济,并在其内部开展地域分工,即各职能部门在中西部开发资源,然后把资源运往东部加工制造,而东部的加工产品又再返回到中西部销售。这样,东、中、西部之间的区际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在各职能部门内部进行的、缺乏竞争的产品互补,而不是商品交换。这种现象,无疑在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形成一个沿着产业链而进行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即中西部生产初级产品及其粗加工产品,而东部再对这些产品进行深加工。这种垂直地域分工,又形成了我国东、中、西部超稳态的地区产业结构和纵向的产业关联,以及在这一产业关联下的特有区际贸易格局。而既有的贸易格局,又往往成为人们评判地域分工是否合理的经验标准,从而掩盖了隐藏于区域经济体制中的深层矛盾。

^① 学术界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存在争论。出于取得数据的方便,本文用国家“七五”计划的划分标准。

为了剖析这种“产品互补”型的区际贸易格局，以及建立在这种区际贸易格局之上的区域经济运行机制，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东、中、西部的内部深层产业结构及其产业关联作进一步的分析。

与全国第三产业普遍落后相对应，三大地带的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都比较薄弱，而且各地所占比重相差无几，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程度甚低。1985年，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三大产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全国为19.7%，东部为20.1%，中部为18.6%，西部为20.8%^①。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轻重的差异。东部农轻重均较发达，轻工业所占比重大，重工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又以产品深加工为基本特征，其产业为轻重农型结构，农轻重的产值比为0.28:0.39:0.33。中西部农业和重工业所占比重大，轻工业比较落后，重工业又以采掘、原材料工业为主，制造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为基本特征，其产业为农重轻型结构，农轻重产值比例分别为0.36:0.28:0.36和0.38:0.27:0.35。某些省区上述特征更加突出。如1985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分别为66.6%、62.0%、63.8%、56.5%、56.1%，而中西部的甘肃、山西、宁夏、黑龙江分别仅为25.8%、28.2%、30.2%、33.5%。再从采掘工业产值与重工业产值的比重来看，中西部的新疆、黑龙江、山西、宁夏、内蒙分别为45.1%、40.7%、33.9%、25.4%、25.3%，而东部的浙江、江苏分别只有3.1%、3.8%。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这种悬殊差异，是与其区际地域分工格局相联系的。而这种地域分工格局基本上是一种以资源和技术经济的空间逆向梯度分布为基础，按照资源（农产品与采掘、能源及原材料工业）——加工制造业进行分工（如烟草——制烟业、羊毛及粗加工——羊毛制品）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这种垂直地域分工格局，对区域产业结构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促使地区产业结构趋向超稳态化，从而阻碍了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化。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区域经济的运行，是在价格扭曲前提条件下，通过中央下达指令性计划这一行政机制即中央对各地方政府的差别约束而完成的。就中西部地区而言，中央的严格约束主要集中在产品产量方面，尤其在为东部补缺的那些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增加量方面；而对于东部地区，中央的硬约束主要集中在财政上缴额的逐年递增方面。这样，国家通过中西部能源、原材料产量的增加来保证东部生产的顺利进行；通过实现东部财政收入人的稳定增长来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包括中央对中西部省区的财政补贴）。由于条块分割，缺乏竞争机制，因而，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缺乏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技术结构高级化的动力机制。这无疑促进了一种超稳态的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

二是在东、中、西部之间形成了纵向的产业关联，进而形成在这种产业关联下的“产品互协”型的特有区际贸易格局。就纵向产业关联本身来说，它与横向产业关联一样，都极为重要。问题是，这种纵向的产业关联在东、西部发生空间错位，特别是中西部某些省区的大型原材料部属企业，其产业联系主要是与东部的纵向关联，而与当地其它行业的横向关联极为微弱。以这种纵向的产业关联为基础，又在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形成了一种“产品互补”型的区际贸易格局。中西部各省区每年向东部调入大量的木材、煤炭、原油、电能、建筑材料、

^① 本文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计算。

基础化工原料、原毛、皮革和烟叶等；东部则把大量的机械设备和轻纺工业产品运往中西部。据统计，1985年东部从中部调入煤炭13728万吨，占东部消费量的40%；从中部调入原油1140万吨，占东部原油消费量的18%；调入电130亿度，占东部电力消费量的6%；调入木材986万立方米，占东部木材消费量的38%。而据有关部门测算，东部轻纺产品产量的1/4调出给西部，1/3调出给中部^①。

可见，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国内区域经济循环基础之上的“产品互补”型区际贸易格局，导致了我国原材料销售市场与加工产品销售市场发生东西向的双重逆向倾斜，即原材料由西向东流动，而机械、轻纺等加工产品由东向西流动。建国初期，由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限制，这种区际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and 国民经济建设曾经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是1978年实行双重模式转换以来，它又逐步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一般比中西部内地雄厚，制成品出口创汇能力也相对较强。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在利用外贸、引进技术、出口创汇留成、财政税收以及投资审批权限等方面，国家都给予了沿海地区较大的政策优惠。然而，在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及国内高档消费品定价过高而导致的出口与内销利润的较大差异的牵引下，沿海地区发展出口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动力不足，其结果，东、中、西部企业在极不公平的条件下相互开展争夺市场、原料的竞争，将导致东部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而中西部的工业生产能力出现萎缩。东部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在上海、浙江表现得最明显。“六五”期间，上海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7.4%，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8.8%，而这种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大推动的^②。1981年上海市外贸出口额为28.41亿美元，而1985年则下降到26.7亿美元。中西部地区生产力的萎缩现象在某些省区也开始出现。1985—1986年，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山西、湖北六省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都出现下降趋势，其中山西下降比重最大(见表1)。

表1：中西部某些省区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四 川	云 南	陕 西	甘 肃	山 西	湖 北
1985	6.24	1.68	2.10	1.32	2.34	5.10
1986	6.17	1.60	2.02	1.32	2.11	4.96

第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地区权限的扩大、以及财政“分灶吃饭”、地区承包、分税制等的实施，蕴藏于这种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内部的东、中、西部各省区间的利益冲突和贸易摩擦日趋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各地方政府都有使其区内产业结构自我体系的完整、独立化倾向。为了保护本地区非优势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各地方政府不惜用行政和其他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计委地区计划局、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2000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预测和定量分析报告(初稿)》1987年。

② 陈郁、杨雄：《从结构非对称到结构推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8期。

手段外堵内卡,筑成种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强制本地商业部门优先收购、销售本地产品,抵制外地价廉质优产品流入,限制本地原材料流出。据调查,从石狮到深圳竟有19处关卡。

二、东、中、西部关系的模式转换与区域经济发展

传统计划体制下,我国东、中、西部的关系,实际上是在价格扭曲前提下,通过中央财政“中介”而形成的一种单一纵向的价值转移——收入分配关系。一方面,通过扭曲的价格机制,形成商品价值由西向东转移;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央财政再分配机制,形成国民收入由东向西转移。

我国现行价格体系极不合理,大多数轻工业产品价格偏高,重工业产品价格偏低,矿产和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明显偏低。价格的严重扭曲,加剧了各产业部门资金利税率的差异。1986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为20.43元,轻工业为27.46元,重工业为17.23元,其中煤炭采选业为-0.62元,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为9.73元,烟草工业为191.08元。这样,在东部的轻纺产品、制造业产品与中西部的能源、原材料及初级加工产品相交换的区际贸易格局下,将形成双重利润机制,促使转移价值从西向东流动。一方面,中西部在向东部输出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价值因价格不合理而转移到东部,另一方面,东部高价返回的制成品还要把一部分中西部的价值带入东部。

价格扭曲以及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又导致我国自解放以来就已形成东部国民收入出超、财政收支盈余,而西部国民收入入超、财政收支亏损的全国支援西部的格局。1952年,西部地区国民收入生产与使用差额和财政收支逆差分别为-1.85亿元和-5.69亿元,到1985年则分别上升到-153亿元和-71亿元(表2)。从实物形态看,东部实现的国民收入出超部分,通过物资调拨或商品出售形式,60%调出给西部,23%调出给中部^①;从价值形态看,则通过上缴财政和横向投资等方式流入中部和西部。而东部财政收支的盈余部分,通过上缴给中央财政,再由中央财政用补贴的形式来弥补中西部的财政亏损部分。这样,通过财政渠道,就形成国民收入由东向西转移。

东、中、西部之间的这种单一纵向分配关系,具有许多弊病。我们知道,我国财政收入

表2:东、中、西部国民收入生产与使用差额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1952	国民收入生产与使用差额	9.4	2.8	-1.85
	财政收支差额	9.67	14.79	-5.69
1985	国民收入生产与使用差额	251.5	-60	-153
	财政收支差额	226.7	-54	-71

^① 国家计委地区计划局、国家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2000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预测和定量分析报告”,1987年。

约有53%来源于工商税收,因而,一个地区的工业实力及工业结构直接影响着地区财政收入状况。对西部地区来说,价格扭曲和结构差异而形成的价值转移,较低的资金利税率,加上原来基础就较薄弱,致使各省区的财政收支大多数入不敷出,区域经济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如果我们剔除中央财政再分配的影响,以区内国民收入生产额和消费额的差值与国民收入的比值即实际积累率来表示区域自我增长能力,就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1985年,东部地区的实际积累率为12.7%,中部为30.1%,而西部只有21.0%。其中青海、西藏、宁夏、广西、内蒙、贵州均小于15%,云南、陕西、新疆、江西小于20%。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互补型”区域经济得以运转,国家只有通过财政渠道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即利用东部的财政上缴额来弥补西部的财政亏损额。这就意味着中央对各地市政府进行差别约束,而这种差别约束又导致各地方政府有着极为不同的经济行为和特征。东部各省区为了保证财政上缴任务的完成,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延扩大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方面,以尽量获取双重利润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的利税。中西部某些省区,由于中央对其财政约束较松,导致地方政府经济核算概念甚差,对自身的财政收入增长缺乏足够的关心,而国家的连年财政补贴,又滋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并形成一种“输血”机制,从而致使地区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改革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以及地区财政包干和分税制的实施,东、中、西部的关系,正在由单一纵向的统配模式向纵横结合的双重模式转换。区域横向经济联合的迅猛发展,冲破了原有僵化体制条块分割的束缚,大大推动了产业要素的空间流动,从而有利于各要素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据统计,1984年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物资协作金额为87亿元,比上年增长76%;而1986年的物资协作金额为200多亿元,比1984年又增长了1.3倍^①。从东西横向投资来看,自1985年以来,东部的上海、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与西部的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四川、贵州、西藏等省区达成并落实了1.58万多个经济技术协作项目。西部从东部引进开发资金近30亿元,引进人才3.4万多人^②。这样,东部从西部得到了大量的原材料,而西部得到了大量的资金。

但是,在中西部原材料东向流动和东部资金、人才西向流动的总趋势背后,也有相当一部分中西部人才、资金发生东向回流。这主要是由于在市场力量作用下所产生的区域累积效应的结果。区域累积效应是指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产业要素向经济增长迅速和资金利润率高的地区集聚的趋势。这种集聚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能获得较高的效率和集聚规模经济;同时,它也会导致各地区之间差异的扩大化。

近几年来出现的西部资金东向回流,主要是以金融系统为中介,以信贷资金存差的方式流向东部。据对我国西北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省区的统计,银行系统长期以来形成巨额存差。1983年底,四省区银行存款余额累计达133亿元,贷款余额仅87亿元,形成46亿元的巨额上存资金,占其存款余额的34.65%,相当于同年中央财政补贴的1.3倍^③。其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区对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

①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8月1日。

② 《经济参考》1987年12月7日。

③ 彭纯等,《我国经济发展中东西部资金流动问题初探》,《开发研究》1986年第1期。

第一, 投资需求不足。西部地区的银行存款, 绝大部分是区外流入资金形成的。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补贴加上中央在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 每年流入西部地区的资金数量很大, 这些资金流入后存入银行增加了财政性存款, 分配给企业, 又增加了企业存款, 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工资, 最后储蓄存款也增加了。同时, 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低, 有些地区甚至低于银行利率。如1986年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 西藏为0.68元, 青海为8.26元, 宁夏为8.82元, 陕西为12.57元, 新疆为13.14元。改革以来, 由于我国平均利润率机制初步形成, 这无疑导致了西部地区对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除非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贴息贷款, 否则, 贷款的需求低于存款的增加, 信贷资金以存差的形式流回东部是很难避免的。

第二, 消费需求不足。尽管中西部某些省区人均全年生活费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由于轻工业产品长期供应不足, 人均全年生活费支出占生活费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 因而居民储蓄率较高。据抽样调查, 1985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全年生活费收入为560.08元,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4%; 而人均全年生活费支出占生活费收入的比重为95.2%, 低于全国97.3%的平均水平, 其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为542.3元,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6.1%, 农民人均储蓄余额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9.9%。

与旧体制下形成的单一纵向的统配模式一样, 这种纵横向结合的双重模式也是建立在国内区域循环的基础之上。因而, 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处理好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关系问题。较为突出的是, 国家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来, 大大增强了各级地方政府对利润的追求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关心。增加财政收入动机和“双重利润”机制的双重推动, 在要素市场和竞争机制发育仍不完善以及缺乏推动产业结构重组的产业政策措施的情况下,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实难避免。东部地区尽管因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使1/3的企业开工不足, 但近几年铁合金、电石、毛纺等高耗能、高耗原材料工业, 不但得不到压缩, 反而继续外延扩展, 其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尽管技术水平较低, 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却遍地开花, 其区内产业结构的完整、独立化过程正在加速。由于财政收入增长指标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 因而, 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各自的财政收入增长, 往往不惜手段, 树立各种各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对地区资源、技术和人才进行封锁和垄断, 从而阻碍了要素市场的发育和要素的流动。

三、建立新型的东、中、西部关系和区域经济格局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又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要建立新型的东、中、西部关系和区域经济格局, 既要重点发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作用, 又要逐步加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开发, 使不同地区都能各展所长, 并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 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要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必须协调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 区域目标与战略选择

均衡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双重目标。这双重目标, 就开发投资来说, 追求均衡目标,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合理均衡地布置经济生产, 逐步缩小各地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的区域差异; 而追求效率目标, 就是求得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最佳投资效益。因而, 是优先均衡目标, 还是注重效率目标, 或者追求保证效率前提下的均衡目

标,则意味着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

建国30多年来,我国在选择国家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处理好效率与均衡的关系。1952—1979年,我国投资的地区分配主要是根据地区平衡发展这一原则来安排的。这一时期,尽管国家对中西部的开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从所获得的区域发展目标来看,既牺牲了效率目标,又没有实现均衡目标。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以“双牺牲”为代价的平衡发展战略。1979年以来,国家的投资重点开始转向沿海地区,然而,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注重了效率,却放弃了均衡。

从效率目标来看,“一五”时期,国家重点抓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以武钢为中心的华中工业基地和以包钢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基地的建设,注意了集聚经济效益;但在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速度上,步子迈得过快。在这5年内动工的694个大型工业项目中,有66% (472个)建在内地,只有34% (222个)建在沿海。这一时期的资金产出率为0.338。“二五”提出要发挥沿海的作用,但1958年的“大跃进”打乱了原有部署,各地追求建立独立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大中小项目遍地开花,致使宏观效益很差,资金产出率为负0.104。1963年又提出备战,在“三五”、“四五”时期搞了“三线”,花了1000多亿元的投资,两个时期内地投资的比重分别增大到66.8%和53.5%,其效益较“一五”时期大幅度下降,资金产出率为0.217。“五五”后期到“六五”,投资的地区重点向东转移,地区布局也作了新的调整,一面发挥沿海地区的潜力,一面有步骤地开发中西部,宏观经济效益开始回升,资金产出率提高到0.272。然而,自“六五”后期以来,国家的投资重点急剧向东倾斜,1984年全民基建投资的内地与沿海之比为1:0.998,二者大致保持平衡;而1986年这一比例却上升为1:1.15(见表3)。

表3 全民基建投资的地区分配

年 份	1952—1985	一五	二五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1984	1985	1986
内地与沿海之比	1:0.79	1:0.87	1:0.79	1:0.46	1:0.74	1:0.84	1:1.02	1:0.998	1:1.07	1:1.15

再从均衡目标来看,1952—1979年,东部与中部的差距,社会总产值扩大了15%,人均国民收入扩大了5%,而国民收入维持不变(表4);东部与西部的差距,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扩大了5%、3%和9%。1979年国家的投资重点转向沿海地区以来,这种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扩大化过程开始加速。1979—1985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的东西部差距,均扩大了4%,这几乎相当于1952—1979年27年内扩大的数字。如如果国家继续推行1985年以来实行的过度倾斜发展战略,那么,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过程将会急剧加速。因而,要全面协调效率与均衡二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应采取适度倾斜政策而不是过度倾斜政策。

2. 动态比较利益与地域分工

一般说来,地域分工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个不同的侧面。垂直分工是指沿着产业链进行的地域分工,而水平分工是指在各产业链之间所进行的地域分工。一个落后地区由自给自足经济转变到发展商品经济,首先参与的必须是垂直地域分工。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种垂直地域分工才会通过因技术引进或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并逐步转变为水平地域分工。地域分工的这种转变,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顺着产业链方向由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到资源加工品的生产和出口;二是逆着产业链方向由进口原材料进行组装加工到整机自己生产和出口。

表4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平衡的扩大(亿元)

年份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中西部之比
1952	社会总产值	567.5	401.2	193.7	1:0.71:0.34
	国民收入	266.3	160.7	92.6	1:0.60:0.35
	人均国民收入	113	84	73	1:0.74:0.65
1979*	社会总产值	4183.8	2353.9	1200.6	1:0.56:0.29
	国民收入	1789.0	1080.76	564.4	1:0.60:0.32
	人均国民收入	451	313	251	1:0.69:0.56
1985	社会总产值	8865	4408	2173	1:0.50:0.25
	国民收入	3840	2202	1094	1:0.57:0.28
	人均国民收入	898	592	462	1:0.66:0.52

注: *西藏为1980年数字。

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发挥地区优势和建立合理的地域分工体系问题,相当大程度上受着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静态分析法的影响。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学者运用这种静态的比较利益观点来分析我们所处的动态的经济世界。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我国东、中、西部之间按照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建立垂直的地域分工体系,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可变的因素。经济相对落后但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改变地区之间各种商品的比较成本比率,并提高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对沿海地区来说,技术力量雄厚,完全有能力发展高精尖产品,而发展一般性产品将意味着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但是,中西部地区实行资源转换战略,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价格体系严重扭曲,而最近几年价格改革停滞不前,这可能促使各地方政府竞相发展那些价高利大的非优势主导产业。第二,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关税、汇率等来保护或促进具有动态比较利益的主导产业的发展,而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由于要素流动相对比较自由,实行资源转换战略以后,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不惜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地区封锁和垄断。第三,由于我国目前基本上还缺乏利用资产增量来推动资产存量实现自我改造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东部地区现有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产业的空间转移的实现也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这可能加剧东、中、西部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利益冲突。为此,中央政府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区域产业政策,从全局的角度进行宏观控制和协调,包括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

(本文责任编辑:王伟东)

WORKER INCOME BUDGETING BEHAVIOR AND SELF-RESTRAINT MECHANISM

Chen Bingcai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China has undergone much improvement through reform and as a result, worker enthusiasm has been given a fuller play. However, with many pressing problems still pending, the question of unfair distribution is far from being solved. In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enough to depend solely on macroeconomic control, whereas an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a self-restraint mechanism in the worker income budgeting proces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cess and cool off the consumption fever.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 RELATIONSHIP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i Yuanka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 vast country with a huge population, China is marked by its wide regional diversities, and how to effect a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such a country is always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his article makes a deepgoing analysis of its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al differences, geographic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ter-regional trade patterns, industrial interrelationships and the flow of industrial elements, and thereby reveals the "intergrowth"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in their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lso goes into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regional economies. The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new idea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type eastern-central-western regional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STATE, ENTERPRISE AND MARKET IN THE INDIRECT MACROECONOMIC CONTROL SYSTEM

Wang Tingxiang Sun Qixiang

"The state regulates the market and the market guides the enterprise," and that is the pattern of the indirect macroeconomic control system China aims to create through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But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a state,